

半世紀臺灣傳播學的書籍出版*

陳世敏**

《摘要》

書籍的出版，是期刊、學位論文、專題研究報告之外的一個學術傳播管道。從傳播學的知識歷史來觀察，至少在早期，書籍的出版和流通影響學術的內涵和發展方向甚鉅。

政大館藏書目中，共尋得 1,648 筆在台出版中文傳播學資料。估計半世紀傳播學書籍總出版量約為兩千本（筆）。其中將近半數是在二十世紀最後十年間出版的。超過半數的書籍出版品，其內容主題與大眾傳播日常業務有關，學術性書籍相對偏少，「宗教傳播」、「健康傳播」兩個主題的書籍出版量甚至掛零。

作者呼籲：傳播學術界的「行政研究」和博碩士論文，應盡可能進行後續加工，抽繹、萃取其學理部份，轉換為書籍出版，才能廣為傳播，有助於建立傳播學在台灣的學術正當性。

關鍵詞：傳播學、臺灣、書籍、出版、知識史

投稿日期：2000年10月3日；通過日期：2000年12月8日。

* 本文初稿發表於中華傳播學會2000年年會「半世紀臺灣傳播學的學術傳播」專題討論會。

** 本文作者陳世敏現任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E-mail: chensm@nccu.edu.tw

壹、研究目的

學科的建立或學術的成長，通常需要學術社群經歷下列階段：研究、發表、學會成立、大學之內學科的建制化。其中，研究成果需廣為傳播，以形成論壇，結合同好，交換心得，累積知識。知識傳播的主要途徑，是創辦期刊和出版書籍，所以「出版」(Publishing)變成學術成長第一等重要的事，美國學術界因而有「不出版就淘汰」之語。此語不僅適用於一個學者，也適用於一個學術學門。觀乎出版狀況就知道學術興替，似乎是學術社群所以對出版始終耿耿於懷的主要原因。新知識需要傳而播之，是學術圈內的自明之理。

人文社會學科專門著作的出版，相較於自然科學，書籍的重要性大於期刊。流傳後世的所謂「經典著作」，多屬書籍。書籍的生命較長，影響力常常擴散到以研究為主的學術圈外，為業界人士所閱讀，也為學生所閱讀。因此，瞭解書籍出版，不僅可以知悉學術研究狀況，也可以略窺這一學科的教育現狀和業界動態。本文關心的，是傳播學的學術發展和知識的累積。這方面，高等教育的角色最是關鍵，其次是傳播產業界。

臺灣傳播學高等教育，始於 1954 年國立政治大學設立新聞研究所，即將屆滿半個世紀。專任教學人力由個位數增至 300 人，相關系所增至五十餘個，每年入學新生約三千人。半世紀傳播學學術研究和出版，就這樣隨著教育體制擴編，從無到有。一般講，學術研究和出版，也可以由專門的研究機構和傳播產業的研發部門為之，但臺灣的中央研究院沒有傳播學相關單位的建制，國家也沒有類似「中華經濟研究院」、「國家教育研究院」(聽說即將成立)的傳播學研究機構。至於民間部門就更加不堪聞問了。規模較大的傳播事業機構的確設有研發單位，但多年來淪為酬庸閒雜人等的「養老院」、「蚊子院」，用來報銷政府規定的研發預算而已。結果，學術研究和學術出版這兩項學術傳播的工作，變成由大學一肩挑，使大學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輕重不分，推遲了知識累積的過程。傳播事業單位與傳播學的學術研究、人才培育無涉，似乎是常軌而不是例外。⁽¹⁾

儘管如此，學術界對於臺灣傳播學相關出版物的數量和性質，迄今已經勾勒了相當清楚的輪廓，分析對象包括學術期刊、學位論文、學術研討會論文、國科會研究報告、其他研究報告——雖然對現象的解釋，仍在隨著學術大環境而變動著。但作為知識傳遞、擴散、儲藏、累積的主要載具書籍，其出版現象還缺乏一個全盤的

研究，這對快速變動的傳播學術界，不免有憾。

本研究目的，是要描繪近半個世紀臺灣傳播學領域之內的中文書籍出版的數量和性質，以協助瞭解傳播學在臺灣的研究、教學和傳播產業的部份生態。換句話說，本研究打算統計臺灣傳播學出版了多少書、甚麼樣的書，並解釋這些現象與「學」「術」兩界的階段性條件有何關聯。書籍的出版，是學術傳播的一環，可以察知學門的成長過程和現狀，自有加以研究的必要。

本研究首先簡介過去對期刊論文、學位論文、專題研究報告（含國科會研究報告和一般研究報告）的流傳情形，總結這幾方面過去的研究發現，接著分析中文傳播學書籍過去五十年的出版，為臺灣傳播學知識史留下階段性見證。

貳、臺灣傳播學知識史

對臺灣傳播學中文出版品的相關研究，大體可歸為三類：書目蒐集、引徵研究、學術發展史研究。

書目蒐集有朱傳譽（1988）〈「中國新聞自由發展史」參考資料舉隅〉、〈中國的新聞學刊物〉、〈現存新聞學著譯目錄〉三種，均收入《中國新聞事業研究論集》一書中。另有張玉法（1970, 1971, 1972）輯錄〈近代中國書報錄〉一種，收錄對象廣及書籍、期刊和報紙。純粹以書籍為對象的書目，首推楊孝潔（1974, 1975）《中國大眾傳播註解書目》。

彭家發（1992）的〈國人以「新聞學」為書名的著作〉一文，收錄徐寶璜、邵飄萍兩人以後的「新聞學」書籍共四十三筆；⁽²⁾ 彭氏編有新聞學「中文參考書目」一種，內含資料五十筆。想是為大學新聞系新生入門科目「新聞學」而準備的參考書書目。彭氏另編「新聞學書目聚珍」，⁽³⁾ 臚列中文書籍資料 318 筆，涵蓋了海峽兩岸三地中文傳播學重要書籍，可謂是中文傳播學術界的有心之作。這三項書目均請參閱彭家發《基礎新聞學》一書。

此外，中國大陸出版有《中國新聞學書目大全》（林德海，1989）一書，蒐錄書目範圍包括專書、教材、期刊、論文集、工具書，始自 1903 年，終迄 1987 年，共得 1900 筆資料。其中「台港 1951-1987」共得 466 筆新聞學書籍、期刊、專題研究報告等書目資料。

至於線上傳播資料庫（鄭瑞城，1999）的建構，基本上也是一種索引書目。這項工程浩大的中文傳播學資料庫，甫於公元 2000 年尾啟用。

屬於引徵研究的，筆者所知有兩篇。第一篇是趙雅麗、鍾蔚文（1999）《傳播學術期刊評鑑報告》。他們的研究，發現中文「傳播學期刊被引用的次數和比率，甚至在傳播學社區內都偏低……最主要的原因是：傳播期刊論文引用之文獻大多數以外文為主。」（頁4）

程麟雅（2000）以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館藏，分析館藏目錄可以支援新聞學專題研究的程度。她核對政大館藏目錄與《新聞學研究》若干論文的參考書目，發現政大館藏可以支援專題研究大約百分之八十。換句話說，《新聞學研究》論文作者使用的資料，不論語文種類，也不論資料的性質是報紙、期刊、書籍、小冊，有百分之二十是政大圖書館館藏目錄所無。研究中也探討了新聞學學術論文最常引用的中英文期刊、書籍。

這項研究雖然不是典型的「引徵研究」（citation study），但相當生動地指出了學術的傳播過程，有助於瞭解大學圖書館服務學術研究的程度，對於圖書館管理者頗有助益。

至於臺灣傳播學術發展史的系統研究，依分析對象，除了書籍，另有期刊研究、專題研究報告研究、博碩士論文研究、綜合研究。

專業期刊的出版方面，中華民國新聞編輯人協會早在1951年6月，即已發行半年刊《報學》，由各主要媒體輪流主編，於三年前停刊，傳播產業界至此失去了唯一的學術交流刊物；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於1966年出版《新聞學研究》迄今。傳播學學術期刊目前定期發行者，還有《傳播文化》、《廣告學研究》、《廣播與電視》、《傳播管理學刊》。零星刊登在鄰近學門的期刊、各大學綜合性學報、《當代》、《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的傳播學學術論文，則難以估計。一般雜文及產業情報的出版，則散見一般報章及《動腦》、《廣告》之類的產業雜誌（trade magazine）。

這幾類出版品刊登過什麼性質的文章，是檢視傳播學知識成長的重要標的。筆者手邊的資料顯示：分析《報學》半年刊的論文，有陳世敏（1970）、董益慶（1996）；同時分析《報學》和《新聞學研究》的，有羅文輝（1995）；分析博碩士論文和專題研究報告的，有汪琪和臧國仁（1992, 1993）；分析《報學》、《新聞學研究》、學位論文的，有朱立（1978）；至於綜合各類資料（包括報紙、非傳播學期刊、時事性雜誌）作分析的，有楊世凡（1985）、祝基溁（1986）、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1987）。⁽⁴⁾

這些研究幾無例外，都試著要回答下列三個主要問題：一，臺灣傳播學研究，

究竟完成了甚麼——在領域、主題、取徑、理論、方法、測量技術上？二，經費由誰支助？三，研究成果如何在學術圈內傳播？

總結來講，從學術研究出版品來看，臺灣的傳播學研究深受美國和歐洲國家的影響。先是以科學主義為思想基礎的美國行為實證研究主宰著學術界，接著引進歐洲批判思想和美國的詮釋思想，使研究開始多元化，其過程亦步亦趨地反映了臺灣高等教育的師資結構。換言之，傳播學專任教師的人數和教師的學術背景，是左右臺灣傳播學發展方向的主要力量。另一股力量是以國科會為要角的經費支助機構。從出版品上看不出來，但隱身在背後的另外兩股力量——國科會的研究獎勵制度和教育部依據大學法實施的大學教師升等制度——才是太上皇。

對傳播學學術傳播的分析研究，更重要的，是透露了統計數字未曾告知的訊息。這項訊息，對半世紀以來的臺灣傳播學，宏觀來說，無疑是學術的主體性問題。

這個問題從未逃過傳播學者的法眼。1978年「武昌起義第一槍」響了起來，地點是香港中文大學傳播研究中心。根據朱立（1978）〈開闢中國傳播研究的第四戰場〉一文記載，是年三月，中文大學舉辦「中國傳播研討會」，目的在於：

「為我國的傳學研究找出一個新的方向，並且為現階段的傳學研究尋一個屬於自己民族的「根」來。除在中文大學的第一次研討會外，同年六月底又在台北國立政治大學舉行了第二次研討會，先後參加研討的有方豪、李亦園、楊國樞、葉啟政、王爾敏、李弘祺、喬健、吳聰賢、梅廣、胡佛……（傳播學界略，以凸顯研討會性質）等三十餘人，集港台二地歷史、社會、歷史、心理、與傳播學之學者於一堂，交換意見，以求能找出學術「中國化」（當時的號召用語）的入手途徑。

「在中國的傳統中去找傳播的道理與原則是一件艱鉅的工作，需要長遠與多方的努力，絕非少數人的力量可以完成……。」（頁20）

請注意：當時關心學術「中國化」的，不止傳播學。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姑不論「中國化」表述是否恰當地反映了當時臺灣學術界的核心關懷，現實上，台大心理系就在此後不久組成「華人本土心理學研究室」，東海社會系也組成了研究本地中小企業經營管理的學術團隊。這兩者，二十餘年來努力耕耘，卓然有成，深得學術界敬重。

相對於心理學界和社會學界的正式團隊，傳播學界的研究團隊，起步較晚，且多係大學體制外的非正式組織。90年代中期，在余也魯、徐佳士、鄭學檬、孫旭

培的號召之下，廈門大學成立「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傳播」委員會，邀請散居兩岸三地相關學門的學者參與，1997年出版了孫旭陪主編《華夏傳播論》一書。後續研究課題，以大陸文史學者為主的研究成果，據聞，近期將陸續收割，進入出版階段。

無獨有偶，王洪鈞（1998）也以個人力量，邀約臺灣傳播學術界人士十餘人，完成相同心願的工作，出版了一冊《新聞理論的中國歷史觀》。

至於自始至終個人獨力完成，以書籍型態出現的思想史著作，不能不提到武漢大學新聞學院李敬一的《中國傳播史——先秦兩漢卷》和張昆的《傳播觀念的歷史考察》二書。大陸學者在傳播思想史方面的造詣，顯非港台學者所能企及，⁽⁵⁾ 值得一提，因為思想史最能反映一地的學術主體性。

以上分析意在說明：知識的發展，從出版的觀點來看，僅依賴學術研討會論文和期刊論文是不夠的。一般博碩士論文和專題研究報告，未經正式出版，只限於私人流傳。書籍有其先天優勢，尤其方便歷史類和思想類大部頭著作的創作馳騁，不似單篇論文通常只能在二十頁之內的方寸迴旋。傳播史和傳播思想的研究，涉及深層文化，是學術「中國化」或「本土化」遲早要面對、無法迴避的主體。寫到這裡，想到國科會的官僚作業，以自然科學重視期刊論文比照適用於獎勵人文社會學門，對於傳播學這類學門的長期發展，是幸還是不幸，套用臺灣電視新聞記者喜用的陳腔濫調，真箇是「還有待觀察」。

學術的傳播當然不限於出版品一途，不過，前述這些對臺灣傳播學各類出版品的研究，不僅反映了將近半世紀傳播研究的狀況，也說明了臺灣傳播學的發展軌跡和包括教學在內的學術生態，或許學者之間不同的觀點可能有不同的詮釋，本論文不擬強作解人。值得注意的是，我們迄今對於書籍的分析研究較少，原因之一可能是書籍種類眾多，散處各處，不易研究。原因之二可能是書籍不是學院研究成果的主要載具，不如期刊或未正式出版的專題報告草稿（例如國科會報告）受到重視。學術界的傳統如此。

這項傳統因為兩項學術常規的強化，使期刊的重要性明顯凌駕於書籍之上。

第一，臺灣各大學的教師升等辦法，漸漸制度化，期刊論文成為升等著作的主要形式。此一風氣，已從自然學門擴散到人文社會學門，傳播學門也受影響，各校新訂升等辦法幾乎都環繞在如何計算期刊論文的質和量問題上。

第二，國科會去年起規定：今後國科會的年度研究獎助，將以「有評審的學術期刊」論文為主要依據。

期刊論文對學術研究成果的傳播，自有其先天優勢，但對於教學和知識流通，書籍有時候反倒更為方便。一般學術期刊論文，詰屈聱牙，大學生不到碩士以上階段很難看懂，社會大眾甚至業界人士也多所抱怨。相對而言，書籍在教學和服務方面，是期刊難望項背的。

相對於前述期刊、學位論文、專題研究報告的學術傳播研究，筆者所知單獨針對中文傳播書籍的學術研究，只有一個，即彭家發（1992）的〈在我國刊行的新聞學四大啓蒙典籍研究〉。他所謂的「四大啓蒙典籍」是：

- 一、日人松本君平之《新聞學》中譯本
- 二、美人舒曼（Edwin Shuman）之《實用新聞學》中譯本
- 三、徐寶璜之《新聞學》
- 四、邵飄萍之《實際應用新聞學》

各書評介均含「作者生平」和「內容簡介」兩部份。彭家發選書也好，詮釋這四本書對中國新聞學術的影響也好，都有獨到之處，是一個奇特而有趣的傳播知識史研究。他重視先驅出版品對後世學科知識的影響，與前述書目編撰或出版數量統計，迥不相同。這是彭氏在前述三項新聞學書目之外，對傳播學學術發展史的另一項貢獻。

綜合以上所述，對學門出版品的分析，有助於瞭解學術的發展歷史及發展脈絡。大學的學術活動內涵，不出研究、教學、服務。在研究方面，考察書籍的出版，可以與考察學位論文、專題研究報告、期刊論文一樣，洞悉學門知識的創造、累積、擴散情形。不過相對而言，書籍更容易反映學校教學和傳播產業的發展軌跡。所以，要總結近半世紀台灣傳播學的學術傳播，有必要分析在台灣出版的中文傳播學書籍，統計其數量，描述其性質。

參、研究過程

本研究受限於研究資源，決定以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館藏的中文書目資料為原始素材，並不以書籍實體為分析的原始素材。政大圖書館傳播學藏書豐富，包括全國博碩士論文和國科會專題研究報告，為其他圖書館所無。而設有傳播學專門圖書館「傳播學院分館」的大學，全台僅此一家。分館蒐藏多為較新的中英文傳播學圖書和期刊，其餘傳播學圖書資料散放於總館、社資中心等處，但由統一的電腦書目檔案管理。

首先根據政大圖書館的圖書分類，查出與傳播學有關的所有類目及其編號，刪除與傳播學無關的類目之後，界定了本研究所指「傳播學」的範圍如表一。

表一：政治大學館藏傳播學書籍之分類號*

分類號	分類名
030	新聞學理論
031	新聞政策
032	新聞採訪
033	新聞寫作
034	新聞編輯
035	新聞事業
036	通訊社（依國分）
037	廣播、電視
038	報紙
039	特種報紙
078	現代普通論文集
320	政治學總論
350	法律學總論
361.2	文化
361.771-2	民意測驗
361.83	大眾傳播
361.84-5	公共關係
364.7	性別
371.4533	電視教學
696.6-69	廣告
760	電影
770	攝影
785.9	配樂
788	民間音樂
789.9	唱片

*表一顯示，早年臺灣的圖書館學如何看待傳播學／新聞學這個領域。表一所顯示者，不過是大眾傳播的產業活動，與今天一般所瞭解的傳播學「學術」的內容和形式相去甚遠，也與當前各校傳播系所課程南轅北轍。必須特別提醒的是：究竟有多少傳播學書籍被歸類到其他書架上，以致未被納入本研究的分析，實在無法估計——尤其是比較晚近、與傳統新聞學漸行漸遠的幾個新領域的書籍。這樣看來，本研究有可能低估了實際的館藏數量，當然也就可能低估了出版數量。

其次，在每一傳播學相關類目之下，按照「政大全球資訊網」上的「圖書館書目資料」，翻查每一筆書目資料，進一步刪除非傳播學書目。⁽⁶⁾

再次，就剩下的中文傳播學書目中，刪除報紙、期刊、專題報告、博碩士論文、影片、錄影帶等「非書」書目，僅留一般所謂的圖書出版品當中的「書籍」，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書」。⁽⁷⁾最後刪除大陸和香港出版社的書，但保留在台重印者，例如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與在台設有分社的香港出版社出版書籍，例如香港新聞天地社在台灣設有辦事處，曾出版了一系列書籍。

圖書館裡，每一本書有一張身份證，叫做「書目資料」，成卡片形狀，資料內容跟附在每一本書前或書後的現行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差不多，不外書名、作者（譯者）、版次、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頁數、厚度（公分）、ISBN、學門（主題、次主題）分類、索書號等身分資料。

同一本書有「複本」者，不論冊數多少都計為一本；一本書同時有平裝和精裝者，有不同「刷次」者，均僅計為一本。⁽⁸⁾但修訂再版的每一版視為獨立的一本；一書數名或一書數家出版，每一書也視為各自獨立的出版品，分別計算。

兩名碩士班研究助理經過協調，在編碼達到相當的相互同意度之後，即按上述定義，根據政大全球資訊網的圖書書目資料，輪流翻閱、登錄每一筆資料。⁽⁹⁾凡合乎條件的書籍，均逐筆登錄，沒有抽樣。編碼及登錄工作時間從 1999 年 12 月起，至 2000 年三月底止。⁽¹⁰⁾

肆、研究結果

表二顯示，半世紀以來，中文傳播學在台灣出版的相關書籍，依據前述過程在政大圖書館書目資料有案可稽的，總共是 1,648 本。如果依照程麟雅（2000）估計的數字加以調整——即政大館藏資料可以支援新聞學專業研究所需資料的百分之八十，另外實際上已經出版但政大沒有蒐藏的書假設為百分之二十——則總數粗略估計為 2,060 本。去掉零頭，推計半世紀臺灣中文傳播學書籍出版量大約是兩千本，平均每年出版 40 本。

表二：書籍數量次數分配表

	次數	%
1947-1960	48	2.9
1961-1970	167	10.1
1971-1980	248	15.0
1981-1990	440	26.7
1991-1999	723	43.9
總 和	1626	98.7
遺漏值	22	1.3
總 和	1648	100.0

程氏的推估並未細分書籍以外的出版品，如果扣除期刊、報紙、學位論文、專題研究報告等研究資源，甚至扣除英文書籍，純就中文書籍而言，則政大館藏滿足研究者資料需求的比例，一定大為降低。假設不是 80% 而是 60% 或更低，則以 1,648 筆不重複的館藏書目資料反推，出版界的實際出版量可能不少於 2,746 本。

這樣的估計，有一個基本假設：研究者在政大以外使用的這 40% 資料已經窮盡了所有的傳播學資料，包括校外每一本中文傳播學書籍都至少被使用了一次。這樣的假設當然有瑕疵，因為政大校內或校外，有些書籍從未被程氏樣本中的數十篇論文作者使用過。所以，實際出版數量應該從三千往上加？

當然不是這個意思。這樣說的目的，只是要指出，程氏的研究與本研究的性質不同，不宜逕自使用程氏的「館藏資料支援率」來推估中文傳播學書籍的總數。但本研究仍徵引她的研究結果，甚至還進一步用來推估中文書籍總數，有一個重要的理由：她的研究方法剛好彌補了本研究在方法上的先天性缺失。本研究事先選定圖書館分類，凡是未落入表一的類目，均鞭長莫及，被排除在研究對象之外；相對的，「館藏資料支援率」的研究方法，只問館藏的有無，不擇特定類目，甚至傳播研究者使用了非傳播學資料也算數。研究方法上的概念，與現實世界中一個研究者使用資料的概念十分貼近。

這裡有一個佐證，或可部份說明採用程氏研究結果作為推估基礎，除了它是本研究可以援引的唯一依據外，也是相當務實、方便的作法。本研究的數據處理，曾把 1,648 筆資料按「出版者」細分，得出主要出版者及其出版品清單。另一方面，研究小組也取得了正中、遠流、三民、電視文化研究會等數個主要出版者的最新圖

書目錄，就傳播學相關的叢書，與本研究清單比對，發現正中的圖書目錄中，與傳播學有關的書系有「傳播理論與實務叢書」、「大眾傳播學叢書」、「社會文化系列」、「大眾傳播學譯叢」等書系共計 52 冊，政大全數蒐藏，但其中 10 冊分類上架時落在選定的類目之外，並未納入本研究的分析範圍。同樣的，遠流最新圖書目錄中的「傳播館」書系，共有 49 本書，政大也全部有館藏，但其中 9 冊落在本研究的研究範圍之外，約佔總數 20%——姑且不論正中、遠流事實上在其他書系裡，還躲藏著零星星的傳播學書籍。

籠統地說，政大館藏傳播學書籍，仍有 20% 左右被歸類到其他類目，不在選定類目類目內，未計算出來。加上政大沒有館藏的部份，以及本研究資料登錄截止至公元 2000 年年底新書，半世紀以來的臺灣傳播學出版量，估計應不少於 2,000 冊。以下的分析，仍以 1,648 冊為基準。

政大館藏最早出版的傳播學書籍，是 1947 年郭步陶《時事評論作法》（正中書局）及 1948 年孫雲軒《攝影初階》（東方出版社）。表二也說明了二十世紀最後十年出版量達 723 本，佔全部 1,648 本的 43.9%。如果考慮最近幾年若干新書可能還未進館，以及二十世紀最後一年在作者執筆撰寫本文當時還有八個月未竟時光，則我們可以說，臺灣中文傳播學相關書籍，有半數是在二十世紀最後十年間完成的。

好玩的是：居然有 22 本書未曾刊載出版年代。這不是圖書館館員疏忽，而是真有其事。筆者私人蒐藏的書籍中，有「中國新聞函授學校」講義小書，各七、八十頁，即未載明出版時間。其中王新命《新聞史》稿末註明「四十二年八月八日新命初稿」，勉強可認出出版時間；俞叔平《出版法概論》第四十三頁提及「去年行政院令頒「新聞用紙辦法」，可推斷是書大約出版於民國四十年（1951）左右；至於另一本潘劭昂《新聞學概論》，出版時間無跡象可循。這三本書版權頁上註明著「非賣品」，也都不見於政大館藏書目資料。

整個傳播學範圍裡，新聞學領域的書最早但非最多。表三可以看出，按內容主題分類，「廣告、行銷與消費行為」比率最高，佔總數 18.7%；其次是「媒介實務、新聞專業技術」，佔 18.4%、「大眾傳播」12.7%，「新聞學與新聞媒體」居第四位 10.6%。其他各類書籍的數量，都在兩位數以下。

表三：內容主題次數分配表*

內 容 主 題**	次 數 (筆)	百 分 比 (%)
廣告、行銷與消費行為	308	18.7
媒介實務、新聞專業技術	304	18.4
大眾傳播	209	12.7
新聞學與新聞媒體	174	10.6
傳播史	128	7.8
傳播法規與政策	85	5.2
電影研究	70	4.2
其他	65	3.9
公共關係	50	3.0
攝影	41	2.5
批判理論、文化研究、政治經濟學、性別與傳播研究	35	2.1
傳播與資訊科技、新媒體	31	1.9
傳播理論	29	1.8
政治傳播	26	1.6
國際傳播、傳播與國家發展	21	1.3
研究方法	15	0.9
閱聽人分析	15	0.9
傳播教育	12	0.7
教育傳播	11	0.7
人際傳播	7	0.4
傳播哲學	6	0.4
組織傳播	3	0.2
口語傳播	3	0.2
總和	1648	100.0

* 宗教傳播與健康傳播沒有任何一筆書目資料。

** 分類方式以汪琪、臧國仁(1996)為本。

情勢很明顯：與商業和傳播媒體作業技術有關的書籍（前四類），佔了總出版量的 60%。臺灣傳播學高等教育教育向來比較陌生的人際傳播、傳播哲學、組織傳播、口語傳播等領域，出版量都只有個位數；宗教傳播、健康傳播甚至掛零，頗耐人尋味。學理較強、批判性較強的書籍問世，是晚近的事。整體說來，社會上需要的，大學用得多的，出版量也大。大學階段的傳播學教育內涵，在二十世紀最後十年起了根本的改變，書籍出版也跟著在急遽轉中，尤其是「批判理論、文化研究、

傳播政治經濟學、性別研究」、「新傳播科技、新媒體」等幾類最是明顯。進一步的分析，請參閱註十一許峻彬的碩士論文。

表四：性質次數分配表

性 質	次數 (筆)	百分比 (%)
來源		
創作	1196	72.6
翻譯	307	18.6
彙編	145	8.8
總和	1648	100.0
表現形式		
專論	1025	62.2
教科書	398	24.2
工具書	120	7.3
其他	54	3.3
會議論文集	51	3.1
總和	1648	100.0

這些書籍是怎麼寫成的？以何種形式表現出來？對於學門發展，這不是重要問題，但可以瞭解知識的傳播過程。用一般眼光來看，屬於作者的「創作」最多，佔 72.6%；翻譯佔 18.6%，其他屬於「彙編」。表現形式則以「專論」62.2% 最多，「教科書」398 本，佔 24.2%。

作者背景方面，雖然歸類的困難度極大，研究者仍然勉強按表五類目歸類。作者係從事傳播業務的「專業工作人士」，比率最高，佔 41.4%；但「傳播學術研究專業人士」（大學專任教師，現任及過去）的作者，總共有 523 人次（31.7%）。值得注意的是，別的學門或別的行業人士撰寫傳播學領域的書，數量不少，有 160 人次，反映了這個領域的博雜特性，及學門與其他領域有許多交會之處。

表五：作者背景次數分配表

作者背景	次數(筆)	百分比(%)
以傳播實務工作為專業的人士	682	41.4
以傳播學術研究為專業的人士	523	31.7
其他學術界或實務界人士	160	9.7
政府單位	64	3.9
學術單位	51	3.1
新聞媒體	49	3.0
其他機構	49	3.0
非營利新聞專業團體	48	2.9
國民黨及其附屬機構	19	1.2
作者不詳	3	0.2
總和	1648	100.0

出版者就更好玩了。總數 1,648 本的書，其出版單位和個人多達 450 個。而僅出版一本書的單位和個人，即多達 300 左右。出版最多的單位，依次是正中（67）、遠流（61）、三民（60）、台北市新聞記者公會（36）、電視研究委員會（46）、中華民國新聞評議會（36）、黎明（35）、商務（31）、新聞局（31）、時報（31）、政大新聞所（29，但不包含「政大新聞系」）、五南（27）。以上這十二個單位，總共出版了總數三分之一的書籍。

以上數字是政大館藏「書目資料」的「筆」數。前曾說明，一筆書目資料不一定等於一本個別不同的書。就個別作者而言，資料「筆」數在「十」以上的，依次是新聞局（26）、李瞻（25）、劉毅志（22）、賴國洲主編（21）、鄭貞銘（21）、樊志育（17）、中華民國新聞評議會（16）、王洪鈞（15）、徐佳士（13）、彭家發（12）、楊孝滌（11）、台北市新聞記者公會（11）、（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11）、李茂政（10）、楊朝陽（10）、馮建三（10），十六個個人或單位的出書量，累計佔總書量的 15.2%。

伍、結語

本研究以國立政治大學全球資訊網之中文書目資料為對象，在扣除「非書資

料」之後，清查傳播學相關領域的書籍數量，發現半世紀臺灣出版之傳播學書籍，總數為 1,648 種。如果政大館藏本研究只篩選了 80%，再加上政大館藏的部份則半世紀以來，台灣中文傳播學的書籍出版數，估計不少於 2,000 種。

根據登錄的 1,648 筆資料推斷，臺灣出版的中文傳播學書籍，大約將近半數是二十世紀最後十年出版的，其中業界人士所寫的商業性和應用性的書籍最多，教科書約佔總數的四分之一。資料也顯示商業出版體制之外的許多個人和單位，是傳播學書籍的作者和出版者，但個別出版量都不大。專門性出版社和大學出版社的體制，還未在台灣建立，致使商業性出版格外醒目。

以上資料的意義，在與學術性期刊、博碩士論文、專題研究報告的長期分析對比之後顯示：書籍的作者主要是傳播專業人士，書籍的出版是一種商業機制，沒有明顯受到大學校園教師個人學術專長，和個人學術興趣日漸多元化的影響，但出版量則與專任教師總數在過去十幾年間大量增加有關。

資料顯示，傳播學書籍的出版，缺乏「主要出版者」。傳播學書籍只是綜合性出版社的部份業務，或是出版社一時興之所至的人情請託結果，不像心理學有「桂冠」，社會學有「巨流」，法學有「月旦」，教育學有「師大書苑」長期經營，直為學術發展添增助力。可能也正是零星出版不利行銷，若干傳播學書籍不是在有限的同仁圈內傳閱，就是市場競爭力弱而上不了書店的書架或被迫提前撤架當廢紙回收。書店少有「傳播」、「媒體」的專架，就是傳播學書籍市場不大的指標。社會學、心理學等學門並非如此。

此外，傳播學書籍的學理性較低而應用性較高，是非常明顯的現象。這固然是傳播學學門性質有以致之，使許多專業工作人員有機會參與業務經驗的交流，但若干重要的學術領域或主題出版量甚少，「宗教傳播」、「健康傳播」甚至掛零，不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臺灣傳播學「學」「術」兩界的獨特價值觀？

那麼，臺灣學界傳播學的出版，如何適當地反映自己的歷史文化經驗？

一般學術創作的出版過程，是先有學位論文和專題研究，再轉化為研討會論文和期刊論文，等到條件成熟再三醞釀，才有書籍的出現。傳播學書籍學理性不高的現象，進一步說明了傳播學在台灣的發展，受到社會觀念（包括出版者和作者）重視實用而非學理的影響。一般觀念認為：傳播學不是一個學術學門，大學傳播學相關科系只是一個服務業者的人才培訓領域。

服務業者沒有甚麼不好，問題是：大學的教學是培養業界人才最有效的方式嗎？特別是當教學者自己也把自己的工作定位為職業訓練時，學術發展就不免相應

重「術」輕「學」了。這可能是臺灣傳播學發展所要面對的最嚴峻的阻力。

數量多不一定形勢大好。最近十年傳播學門專職教學與研究人員，隨著高等教育系所擴張大量增加，但絕大多數書籍是編著、評論、改寫、翻譯性質，屬於原生性創作的（原稿即準備出書，例如朱謙與漆敬堯合著《臺灣農村社會變遷》，1984，商務。雖然這本書的一部份曾在英文期刊發表，見朱謙，1995）屈指可數，少數這類書籍事實上是教師應付升等之作。近年來開始有博碩士論文正式出版成書，例如陳儒修《臺灣新電影的歷史文化經驗》、梁欣如《電視新聞神話的解讀》、朱全斌《媒體、認同與傳播新科技》，象徵了臺灣傳播學學術傳播進入新的里程。畢竟，論文和研究報告並不能完全取代書籍的學術傳播功能。書籍的壽命長，發行範圍廣，對知識的傳播和「學」「術」兩界的切磋有較佳的功能。業界人士較少去閱讀純學術期刊，如果業界不瞭解學界在做甚麼，他們又怎能參與知識的創造和累積的工作？

筆者個人的粗淺觀察，覺得傳播學界少把專題研究報告和博碩士論文改寫成書籍出版，不一定是客觀上缺乏出版機制，而較可能是作者自己主觀上缺乏意願。舉例來說，政府機關或民間團體委託的專題研究，執行時受到較多限制是事實，但這一類被稱為「行政研究」的委託案，通常經費較多，進行過程又可得對方的資料協助，成果不差。如果善加安排，在不違反研究合約的情形下另出專書，是可行的。一般的研究報告，少有在學術界流傳者。只有另出專書，傳播研究成果才可能見聞於學術界。美國傳播學界一些經典著作，像研究親身傳播的《美國大兵》（The American Soldiers），研究大眾傳播效果的《人民的選擇》（The People's Choice）及其後一系列研究，均是接受美國政府委託的「行政研究」；前者提出了「相對剝奪感」理論，後者開啓一世代的媒介「最小效果論」研究，對傳播學知識的發展，影響極深。可見，「行政研究」改作得當，未必會是學術發展的絆腳石。⁽¹¹⁾

困難在於改作有其侷限。此處的侷限非關作者的能力，而是來自當前學術的獎勵制度和審查制度不利於原創性知識以書籍的形式出版。這些年，國科會的獎勵辦法和教育部的升等辦法，有意無意之間引導知識的傳播走向「期刊化」——以發表在學術期刊上的論文數量和品質，為評審取捨依據。若干學門甚至把主力放在著名英文期刊上，加重計分。以書籍形式傳播學術，空間相對變小。這是人文社會學術「中國化」（本土化、在地化）的一個不利因素，傳播學門也無法倖免。

知識未得充分流傳，除了「學」「術」兩界因缺乏書籍這個交流管道而獨行其是（尤其是兩岸三地的學者之間），一般社會人士因此無法得知傳播學界的發展狀

況，其他人文社會學門的知識工作者也沒有機會利用傳播學者的研究成果。引徵無門，久而久之傳播學只好在自己的學術圈內近親繁殖或孤芳自賞了，難以為其他領域認同，建立學術正當性。

這是傳播學界無可迴避的共同問題。解決之道，除了組織研究團隊（朱立，1995；陳世敏，2000；蘇鑰機，2000；林文剛，2000）之外，最重要的是要講求學術傳播的策略和機制。質言之，要多出版學術創作的書籍，不論是原生性書籍或由期刊論文、學位論文、專題研究報告改作的書籍，都有助於傳播學的傳播。

近十年來台灣傳播學專任研究人力大量增加，知識的創造和累積走出期刊論文、學位論文、專題研究報告，另闢「書籍」這個第四戰場，時機似乎已經成熟了。並不是說，書籍就比期刊或專題報告重要。書籍在學門的建立和知識的累積方面，兼具博大與縱深的特性，經得起時間沈澱，顯非其他的知識傳播途徑所能相比、取代。就傳播學知識史的角色而言，臺灣一地，書籍迄今只是配角。⁽¹²⁾

註釋

- (1) 鄰國日本的大媒體，研發單位不但從事相關業務的研究，也從事學術性研究。博報堂的「綜合文化研究所」（《分眾社會》一書即其招牌著作之一）和NHK的「文化研究所」（出版學術期刊 *Communication Journal*）學術性研究成果赫赫有名，是英文世界獲取日本傳播學術資訊的窗口。英國的BBC、ITV研究人才濟濟，也是少數能夠與學術界對話的大眾傳播機構。研究工作應該分工，把基礎研究（病理研究）交給大學，把應用研究（臨床研究）交給業界。同樣的，人才培訓也應分工，通識教育歸大學，專業技術教育歸業界。日本和英國大眾傳播「學」「術」兩界，研究和從業人才培育，正是採取這種模式。
- (2) 加上徐寶璜、邵飄萍以及彭家發自己的《基礎新聞學》（1992，三民），中文世界以「新聞學」為名的書籍，總數應是四十六冊。筆者個人收藏還包括下列各書是彭氏書目所無，大部分是《基礎新聞學》問世以後的作品。故以「新聞學」為名的中文書籍，迄今總數應在五十四冊以上。
何光先（1991）。《現代新聞學》。重慶：重慶出版社。
劉建明（1991）。《宏觀新聞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李 瞻（1972）。《新聞學》。台北：三民。
余家宏、寧樹藩、葉春華（1985）。《新聞學基礎》。合肥：安徽人民出版

社。

陶 涵 (1992) 。《比較新聞學》。北京：文津出版社。

孫旭培 (1993) 。《新聞學新論》。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

吳高福 (1993) 。《新聞學基本原理》。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彭家發、馮建三、蘇衡、金溥聰 (1997) 。《新聞學》。台北縣蘆洲：國立空中大學。

又，英文 journalism 一字，中文跟隨日人譯為「新聞學」，筆者認為並不是很恰當的。這個譯名涉及我們這個學門的正當性問題，不應視為一個「美麗的錯誤」。參見陳世敏 (1999) 。

- (3) 「聚珍」，有「名著書目」之意。究其內容，「新聞學」似指「大眾傳播學」。猜想這是為大一入門科目「新聞學」所列參考書目。課名「新聞學」而授課內容包含「大眾傳播」，似是臺灣傳播學術界學術界通例。

彭氏也談及前輩學者姚朋曾引介美國新聞學學者 Frank Mott 〈新聞學書目兩百種〉。承許峻彬先生告知，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期刊編輯 Paula M. Poindexter and Jean Folkerts (1999) 兩人，最近曾徵詢若干 AEJMC 會員，以當今的眼光，選出了這個領域的名著書目（學生必讀書目）。這份書目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聞及大眾傳播」的學術發展軌跡。按書名字母順序抄錄如下供參考。

- 1, *All the President's Men*, Carl Bernstein and Bob Woodward, 1974.
- 2,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Harold Adams Innis, 1951.
- 3, *Content Analysi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Ole R. Holsti, 1969.
- 4, *Deciding What's News*, Herbert J. Gans, 1979.
- 5,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Everett M. Rogers, 1962
- 6, *Emergence of a Free Press (and) Legacy of Suppression: Freedom of Speech and Press in Early American History*, Leonard Levy, 1960.
- 7, *The Emergence of American Political Issues: 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the Press*, Donald L. Shaw and Maxwell E. McCombs, 1977.
- 8, *A Free and Responsible press*, The Commission on Freedom of the Press, 1947.
- 9, *A History of American Magazines (5 vols.)*, Frank Luther Mott, 1930-1968.
- 10, *A History of the Black Press*, Armistead S. Pride and Clint C. Wilson , 1997.
- 11, *The Kingdom and the Power*, Gay Talese, 1969.
- 12, *Knowledge is Power: The Diffusion of Information in Early America*, Claude

- Bonnange and Thomas Chantal, 1989.
- 13,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Gaye Tuckman, 1978.
 - 14, *Many Voices, One World*, The MacBride Report, 1980.
 - 15, *Mediating the Message: Theories of Influence on Mass Media Content*, 2nd ed., Pamela J. Shoemaker and Stephen D. Reese, 1996.
 - 16, *Mileston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Shearon Lowery and Melvin L. DeFleur, 1983.
 - 17, *The Medium is the Massage*, Marshall McLuhan and Quentin Fiore, 1967.
 - 18, *The Mirror Makers: A History of American Advertising and Its Creators*, Stephen R. Fox, 1984.
 - 19, *News That Matters: Television and American Opinion*, Shanto Iyengar, 1987.
 - 20, *Out of Order*, Thomas E. Patterson, 1993.
 - 21, *The People's Choice: How a Voter Makes Up His Mind in a Presidential Campaign*, Paul Lazarsfeld, Bernard Berelson, and Hazel Gaudet, 1984.
 - 22, *A Place in the News: From the Women's Pages to the Front Pages*, Kay Mills, 1988.
 - 23, *The Powers That Be*, David Halberstam, 1979.
 - 24, *The Process and Effects of Mass Communication*, rev. ed., Wilbur Schramm and Donald F. Roberts, eds., 1971.
 - 25, *Public Opinion*, Walter Lippmann, 1922.
 - 26, *Precision Journalism: A Reporter's Introduction to Social Science Methods*, Philip Meyer, 1973.
 - 27, *Prelude to Independence: The Newspaper War on Britain, 1764-1776*, Arthur M. Schlesinger, 1958.
 - 28, *Printers and Press Freedom: The Ideology of Early American Journalism*, Jeffery A. Smith, 1988.
 - 29, *Split Image: African-Americans in the Mass Media*, Jannette L. Dates and William Barlow, 1990.
 - 30, *A Question of Sedition: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Investigation of the Black Press During World War II*, Patrick S. Washburn, 1986.
 - 31, *Television and Human Behavior*, George Comstock, Steven Chaffee, Natan Katzman, Maxwell McCombs, and Donald Roberts, 1978.
 - 32, *Television in the Lives of Our Children*, Wilbur Schramm, Jack Lyle, and Edwin B. Parker, 1961.

33,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Marshall McLuhan, 1964.

34, *The Uses of Mass Communication*, Jay Blumler and Elihu Katz, 1974.

35,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Todd Gitlin, 1980.

要附帶一提的是：彭氏《基礎新聞學》第六章〈我國新聞學者的英著〉，介紹了涉及「我國」的英文著作書目。不過這一書目限於「新聞學者」的作，其他學門學者的著作，例如旅美劉平麟有關中國大陸宣傳說服的著作，未錄在內。本文引徵的楊世凡、祝基澄、張玉法書目，都收錄了少許英文著作。不過，中文世界的傳播學術英文書目，不論原作者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目前已經有一個幾乎完美的英文書目問世。張讚國教授負責的「華人傳播學會」（Chinese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CCA）網頁，輯錄了有關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ies 的英文專書、書籍篇章、期刊論文，計臺灣六十餘筆，香港八十餘筆，中國大陸三百筆。請從中華傳播學會網址<http://ccs.nccu.edu.tw>連結 CCA，然後點選 research archives 進入書目。猜想得到：從英文出版品看臺灣傳播學發展，定有另一番景象。

- (4) 原著未刊登研究主持人姓名。據悉，研究主持人是祝基澄，研究助理是楊世凡。
- (5) 《中國傳播思想史---先秦兩漢卷》的完成，猜想係獨立於臺灣兩本類似著作之外，即方鵬程《先秦合縱連橫說服傳播的研究》（台北：政大新聞所碩士論文）和張玉法（1966）《先秦時代的傳播活動及其文化與政治的影響》（台北：政大新聞所碩士論文，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出版。1993 臺灣商務印書館再版易名《先秦的傳播活動及其影響》。海峽兩岸學者作學問卻不相聞問的情形，不只這一件。
- (6) 「傳播學」的內涵和領域，圖書館分類與學界的認定，肯定會有若干出入。本研究中，有關電子、電腦、電訊方面，我們刪去了看似以科學學理和技術為主的書目，但保留偏向社會文化與政策的相關書目。同樣的，圖書館專家把若干很普遍的「傳播學」書籍編目在別的領域之下，是極有可能的。可惜，本研究無法估計出「漏網之魚」到底有多少。

此外，本研究依分類號篩選傳播學書籍的方式，在分類號 760-769 有關電影的部份只取分類號 760「電影總論」共 84 筆書目來篩選，770-779 有關攝影的部份只取分類號 770「攝影總論」67 筆書目來篩選。查詢比對政大圖書館目錄

後，得出電影部份遺漏 761-769 共 340 筆書目，攝影部份遺漏 771-779 共 338 筆書目。

至於傳統上歸類為傳播學但書目資料卻歸類在其他學門之下的，想必不少。

- (7) 要仔細推敲的話，「書」的定義應可分為圖書館學定義、出版法定義、著作權法定義、常識定義。本研究從後者。
- (8) 臺灣許多出版者至今仍把「刷次」與「版次」混為一談。書籍版權頁上寫著「第二版」、「第五版」，大多是「第二刷」、「第五刷」之誤。
- (9) 依書名做主題分類，是危險但又不得不做的事。本研究的分類工作，毋寧說是研究者的個人印象式的宏觀研究，較不是嚴謹的科學研究，所以分類工作不是很精確，也沒有精確計算編碼員之間的「相互同意度」。最嚴謹的，應當是實際讀畢每一本書之後再做分類工作。沒有人辦得到。但是這樣的研究總得有人先動手試試。

感謝政大新聞系碩士班研究生許峻彬、黃瑞斌協助完成本研究。感謝政大新聞系支援部分人事經費。感謝陳翰寧先生慨借手提式電腦一部。

- (10) 在編碼期間入館新書，可能未列入分析而成為漏網之魚。
- (11) 這兩項研究恰巧也是量化的研究。可見，量化研究未必如同若干傳播學「質化原旨教義派」所稱一無是處。
- (12) 本研究的統計，限於整體描述；交叉分析部分已由許峻彬另撰成文《從書籍出版分析臺灣傳播學的發展（1947-1999）》，政大新聞學系碩士論文，2000年6月。這 1,648 本書的作者、書名、出版社，已按內容類目及出版年代，刊登在中華傳播學會網頁上。

參考書目

- 王洪鈞（1998）。《新聞理論的中國歷史觀》。台北：遠流。
- 朱立（1978）。〈開闢中國傳播研究的第四戰場〉，《報學》，6(1): 20-27。
- 朱立（1995）。〈傳播研究「中國化」的方向〉。臧國仁編《中文傳播研究論述》，頁 21-37。
- 朱全斌（1998）。《媒體、認同與傳播新科技》。台北：遠流。
- 朱傳譽（1988）。《中國新聞事業論集》。台北：商務。
- 朱謙（1995）。〈中文傳播研究三十年回顧與前瞻〉，臧國仁（編）《中文傳播

- 研究論述》，頁 11-17。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研究中心。
- 朱 謙、漆敬堯（1984）。《臺灣農村社會變遷》。台北：臺灣商務。
-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及社會發展處（1986）。《新聞與大眾傳播學》（學門
規劃資料）。台北：作者。
- 汪 琪、臧國仁（1992）。〈臺灣地區傳播研究初探〉，朱立、陳文（編）《傳播
與社會發展》，頁 397-416。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系。
- 汪 琪、臧國仁（1993）。《臺灣地區傳播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中文傳播研究
暨教育研討會」論文。臺灣：桃園市。
- 汪 琪、臧國仁（1996）。〈成長與發展中的傳播研究〉，《新聞學研究》，53:
61-84。
- 李敬一（1996）。《中國傳播史——先秦兩漢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 李 瞻（1972）。《新聞學》。台北：三民。
- 余家宏、寧樹藩、葉春華（1985）。《新聞學基礎》。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 何光先（1991）。《現代新聞學》。重慶：重慶出版社。
- 吳高福（1993）。《新聞學基本原理》。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 林文剛（2000）。〈甚麼才是華人傳通生態問題：中華傳媒生態文化史初探〉，
《傳播研究簡訊》，22: 11-13。
- 林德海（1989）。《中國新聞學書目大全》。重慶：新華出版社。
- 祝基滢（1986）。《我國新聞學與大眾傳播學研究現況之分析》。台北：國科會。
- 孫旭培（1993）。《新聞學新論》。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
- 孫旭培（1997）。《華夏傳播論》。北京：人民出版社。
- 張玉法（1970, 1971, 1972）。〈近代中國書報錄〉，《新聞學研究》，7: 293-
359；8: 367-391；9: 477-485。
- 張 昆（1997）。《傳播觀念的歷史考察》。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 梁欣如（1993）。《電視新聞神話的解讀》。台北：三民。
- 陳世敏（1970）。〈報學之內容分析〉，《報學》，4: 45-49。
- 陳世敏（1999）。〈關於傳播學入門科目的一些想法〉，中華傳播學會年會專題討
論論文，新竹縣：關西。
- 陳世敏（2000）。〈教育部「學術追求卓越」下文〉，《傳播研究簡訊》，21: 19-
21。
- 陳儒修（1993）。《臺灣新電影的歷史文化經驗》。台北：萬象。

- 程麟雅（2000）。〈政大館藏支援新聞學研究之探討〉，「中華傳播學會年會專題討論」論文，台北縣：深坑。
- 陶 涵（1994）。《比較新聞學》。北京：文津出版社。
- 彭家發（1992）。《基礎新聞學》。台北：三民書局。
- 彭家發、馮建三、蘇蘅、金溥聰（1997）。《新聞學》。台北縣：國立空中大學。
- 楊世凡（1985）。《臺灣大眾傳播學術研究之表析 1964-1985》。台北縣新莊市：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楊孝滌（1974, 1975）。〈中國大眾傳播註解書目（上）、（下）〉，《新聞學研究》，13: 127-194；15: 185-236。
- 楊孝滌（Yang, Shou-Jung 1977）。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Taiwan，《東吳政治社會學報》，1: 92-117
- 趙雅麗、鍾蔚文（1999）。《傳播學術期刊評鑑報告》。台北：國科會。
- 董益慶（1996）。〈報學雜誌的內容分析〉，《報學》，8(9): 143-152。
- 劉建明（1991）。《宏觀新聞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鄭瑞城等（1999）。《建構傳播資料庫之研究（第一期）》。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
- 羅文輝（1995）。〈臺灣傳播研究的回顧 1951-1995〉，「分析社會的方法學術研討會」論文。臺灣：屏東市。
- 蘇鑰機（2000）。〈發揮「皮匠效應」提高學術素質〉，《傳播研究簡訊》，22: 4-6。
- Poindexter, P. M., & Folkerts, J. (1999, Winter). Significant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Book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J&MC Quarterly*, 76(4), 627-630.

Communication Book Publishing in Taiwan

Shih-min Chen *

ABSTRACT

Book publishing is a means by which knowledge in a discipline can be disseminated to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nd accessed by people in the industry.

In the area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shows that early books of its kind helped shape the discipline to a great extent.

A total of 1,648 items (books) were found in th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s libraries. By estimation, about 2,000 Chinese books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were published in Taiwan in the last 50 years. Nearly half of the collection was published in the last decade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over half of it was books relating to practical aspects of mass communication industry. No single item on religious communication and health communication was found.

The author urges the communication researchers in Taiwan to labor and sweat on transforming administrative research reports into books to get better visibility among academic communities at large.

Keywords: Communication Studies, Taiwan, Books, Publishing,
Intellectual History

* Dr. Shin-min Chen is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